

走出数字困境：新型公共领域内对话伦理的存续与重构

袁航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对话伦理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 但以数字平台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公共领域的出现, 让对话伦理陷入了“难以凝聚共识”的数字困境。事实上, 对话伦理的基础仍存在于数字平台内, 但通过对公共议题“守卫者”隐退的分析, 会发现这类有助于凝聚共识的“守卫者”在数字平台中变为以营利为目标的算法逻辑。它打着“个性化服务”的旗号割裂了传统公共交往空间, 反映出商业化的数字平台所带来的话语法则的强迫。冲破话语法则桎梏、在数字平台内重建主体间交往的共识性规范, 应当从数据安全制度、流量分配监管、头部平台自营业务监管三个方面规制流量垄断现象, 推广政府主导的复合型智能高效数字平台, 营造适合对话伦理有序发展的商谈性公共空间。

关键词: 对话伦理; 数字平台; 算法逻辑; 平台话语法则

中图分类号: B516.59; D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5-0051-08

从逻辑上来看,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界对政治社会秩序的探索并未脱离“休谟问题”的框架, 即在确立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应然关系的基础上论证理性多元社会之公共性的现实寄托, 并在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动态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双重关切的过程中构建一套复合型理论系统。这种考量不能完全依靠纯粹理性的规则, 而应当建立在主体间的对话伦理基础上, 其内容在于协调个体性和公共性的矛盾, 让生活世界不再笼罩于抽象普遍主义规范的迷雾之中。由此, “如何凝聚共识”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界长久以来争论的话题, 因为共识得以凝聚的前提正是对话伦理的核心内容——主体间实践行为的普遍规范。曾经被近代欧洲道德哲学家采纳的共同“人性”, 被证明是在共同的血缘身份、地缘背景基础上“有局限”的普遍前提, 公民身份的严格定义也难以取得跨越社会制度和政治安排的“共识”。当我们发现对对话伦理的探索不能寄希望于德国古典观念论抽象的先验性原则时, 我们自然会转向现实的物质生产和根植于其上的公共领域形成过程。在此背景下, 罗尔斯将对话伦理归纳为以相互性原则为基础的“重叠共识”, 实现该目标的前提是区分公共性的政治讨论和完备性学说, 以公共议题凝聚各方共识。哈贝马斯在谈及凝聚共识的理性原则时指出: “这里的理性不是一种神秘抽象的、虚无缥缈的、由精神虚构出来的纯思辨的东西, 而是具体的, 存在并体现于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之中。”^[1] 公共领域的变迁始终伴随着这种理性的具体应用: 从城邦时代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 到沙龙、咖啡馆的文学评论组织, 再到印刷媒体带来的舆论公共空间变革。哈贝马斯为我们梳理了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内在逻辑, 其主体间性理论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新闻媒体即媒体化公共空间的理论研究。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新兴传媒技术的发展, 数字平台作为新型公共领域登上交往舞台, 也引发了研究者对当前对话伦理新变化的思考: 如果交往的逻辑触及“物质性”这样一个传统公共领域形成的底

收稿日期: 2024-07-03; 修回日期: 2025-05-06

基金项目: 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项目“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公共理性研究”(ZB21BZ0321)

作者简介: 袁航, 男, 辽宁大连人, 哲学博士,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波士顿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 当代政治哲学, 联系邮箱: yuanhangnkphi@126.com

层逻辑,如果新型公共领域的形成不再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看得见、摸得着的面对面的生活交际规范,如果对话、沟通和协商的时效性远超传统公共领域所能承载的“上限”,那么对“如何凝聚共识”的研究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新型公共领域建构逻辑的探索,而数字平台中议题“守卫者”转变为商业化算法逻辑的事实,也将为对话伦理共识性的证成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对话伦理的数字困境:数字平台中的“共识”何以凝聚?

对对话伦理的讨论始自哈贝马斯的两卷本《交往行为理论》中对合理性问题与交往行为(Kommunikatives Handeln)关系的研究,“在交往行为中,个体参与者借助言语行为的‘以言行事’的约束效果来协调行为领域的内容”^[2],而交往行为需要以公众认可的社会规范作为行为准则。因此,交往活动的参与主体通过语言等方式在公共领域中提出有效性要求,交往行为在此不仅是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对话行为,还是“使参与者能够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即在行为者共识基础上,通过规范调节实现个人与社会一致的行为”^[3]。以语言为中介、以交往为方式、以共识为目的,这就是哈贝马斯塑造主体间交往规范的“合理性”(Rationalität)的来源。因此,对话伦理始终指向社会成员行为的规范性准则,且只有取得参与者的共识性认可,这类准则才能在公共领域的协商过程中发挥作用。

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主体间交往的方式,也引发了对话伦理现实基础的变化。作为传统公共领域媒介的纸质报刊和电子化大众传媒依然存在,但其传播和互动功能正逐渐被数字媒体所削弱并取代,原本由主流媒体所主导的对话伦理框架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不断“形变”,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迄今为止在公共领域普遍存在的交流模式”^{[4](44)}。近代欧洲的道德情感主义主张道德规范的制定来自人的情感共鸣,“道德概念总是包含着某种人类共有的情感”^[5]。但这种共鸣实质上来自共同的血缘身份和地缘背景,来自在共同的实践传统中发展出的共识,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过程中的共识性原则也来自这种共鸣。在对话伦理的语境下,“共识”指主体间共同表达的共同诉求,它存在于公众的共同生产和生活之中,是人类在“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中”^[6]进行社会性实践活动的结果。不同于康德对共识的纯形式要求和阿伦特将共识视作公共领域属性的观点,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揭示出人类共识性认识的物质基础。共识的形成需要个体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趋向一致,但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这种趋向性受到社会交往方式、主体发展状况、公共价值规范等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其凝聚过程往往以一种缓慢形塑的方式进行。在数字时代之前,这种共识的凝聚并不困难,因为传统媒体在空间辐射范围上是有限的,其传播广度往往限于某个社会之内,或者形态相近、拥有共同实践传统的社会之间。但在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辐射范围借助数字技术大幅提升,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协商的平等化,即“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发意见的无限制交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4](46)}。由此,传统公共领域的共识性原则难以有效融入数字公共领域,最终形成了对话伦理的“数字困境”。

一般而言,数字公共领域的载体是数字平台,它们为用户制定出数字交往的应然秩序,也为自媒体和流媒体提供施展的空间。综合当前国内外的研究,数字平台一般被视作为数字产品和服务生产提供技术支持的部门^[7],用于用户交互、数据承载和利用网络效应实现价值创造和获取^[8],公共意见的协商讨论则以数据的形式在数字平台内流通。与传统公共领域不同的是,数字平台的核心要素是承载信息的数据,这类在平台内部流通的数据势必会受到算法的赋形,使原本具有复杂商业功能的媒介产生“平台化”的转变。例如,腾讯、X(原推特)、谷歌等全球网络巨无霸公司所提供的平台服务都以综合性为特征,用户在平台内部交往时受到算法影响,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加入全球数字社会的版图。有学者指出:“正是发生在数字平台上的数字劳动和交往活动被算法捕捉,进而让商业实现了对生活

世界的全面入侵，导致公共领域新的转型。”^[9]

明确公共领域新转型的特征，为对话伦理论证新的合理性根基，需要从三个方面对数字公共领域带来的新挑战作出解答。第一，数字化的交往实现方式和共识性“规范”是否与传统公共空间内的物质性交往毫不相干？对该问题的回答是判断数字时代对话伦理是否存在的前提。第二，作为数字交往的集中领域，数字平台和传统公共空间的区别究竟体现在何处？对该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揭示数字平台广泛参与的极度“平等化”特征。第三，随着用户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新型公共领域对对话伦理之共识性规范的作用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该问题的回答直接关乎对话伦理在数字平台中的存续与否。

关于前两个问题，我们不难给出确定的回答。首先，数字交往的“规范性”仍需建立在物质交往的基础上。聚焦数字交往的性质，奈格里和哈特提出，作为数字交往最显著形式的数字劳动兼顾物质产品之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本身，这就决定了其他劳动形式及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10]本质上是一种“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温赛克则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史前史”出发，从制度主义与文化产业学派的理论资源中寻求“内在批判”的崭新立足点^[11]，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划分界限”。与之相反，以福克斯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数字劳动仍属于物质劳动范畴，指出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工作同样是信息工作的具体形式之一^[12]，围绕数字展开的交往活动依然受到物质属性的制约。新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整合了传播的动员、认知、协调能力，让数字平台的参与主体转变为集“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角色于一身的“产消主体”^[13]，使人的创造力彻底转化为商品，而人的创造力从根本上依赖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事实上，数字劳动所谓的“非物质生产过程”已经内含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范畴中^[14]，人的所有劳动都具备物质性(创造使用价值)和非物质性(创造价值)两个方面，而数字劳动和数字交往活动在抽离那些精密烦琐的数据环节之后，本质上是人的不可计算的生命活动的体现。按其性质来说，这是一种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对象世界的活动。无论是有形的生活世界还是无形的虚拟世界，均属于对象世界的一体两面，展现出人改造世界的对应成果。此外，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依赖信号基站、宽带、光纤等物质性的基础设施。信号虽然不曾“有形”，但它们的“客观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数字交往离不开物质交往，离不开物质性的人类实践活动。

其次，数字平台和传统公共空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公共议题“守护者”的“不在场”。哈贝马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交往伦理时构建了一个对话伦理的前提，即媒体化公共空间的形成。无论是沙龙、咖啡馆这类近代资本主义中的公共空间，还是以印刷媒体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公共空间，都曾有“专业化的工作人员”作为公共议题“守护者”存在，“这些人员包括为新闻机构、媒体和出版社工作的记者，即在媒体和文学事业中履行作者、编辑、校对和管理职能的专业人士”^{[4](39)}。他们的存在客观上确保了公共对话能够排除交往行为中私人领域的“无效噪音”，但数字平台作为现代公共空间却“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发意见的无限制交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4](46)}。自媒体和流媒体的普及让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内容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公共领域中，原本集中的公共议题客观上呈现出离散化的趋势。面对数字技术极大模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界限的现实，曾经的议题“守护者”显得无能为力，他们在传统公共空间内对抗的私人性、排他性言论也不可避免地进入数字平台，使后者的包容性逐渐产生分裂和矛盾^[15]。

虽然我们能够对前两个问题做出回应，但是在面对第三个问题时似乎陷入了困境：如果更平等、更广泛的公共参与有助于凝聚共识，那么这种掺杂着私人领域“噪音”的共识是否会取决于“话语权”和“音量”的强弱，而不是公共议题的审慎和包容？如果更平等、更广泛的公共参与无助于凝聚共识，那么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对话伦理是否会因此失去合法性的根基？当代政治哲学家们尝试从不同角度回答这一问题，例如罗尔斯以无知之幕遮蔽“原初状态”中的社会成员，迫使人们只能做出“理性人”的选择来赞同他的差别原则；哈贝马斯以“合理的商谈”来规避协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非

中立性问题,高度理想化的商谈程序能够确保议题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意见得到同等表达。不难发现,这类建构性的观点努力的方向是排除私人领域中的完备性学说,使公共议题的讨论更加“中立化”“理性化”。但是这同样会带来一种“理想主义”的诟病。比如杰拉德·高斯就曾提出“公共成员”(member of the public)这一概念以说明参与者的“价值中立”虽然在逻辑上可能存在,但其本质不过是一种思辨的学术表达,是“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的理想化对应物(idealized counterparts)”^[15]。有批评者也认为,“公共成员”并不具备达成社会道德或政治安排的共识能力^[16]。

那么,问题是否在于平等而广泛的公共参与从一开始就同“凝聚共识”的交往努力背道而驰?这显然是一种有悖于常识的判断。如果公共参与的程度同凝聚共识的广泛性成反比,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哈贝马斯在阐述对话伦理时提到的从小范围的“沙龙社交”到大规模的“公共舆论”的转变?显然,公共舆论借助印刷媒体赢得了比沙龙社交更广泛的公共参与度,但这并不表示它比后者更难凝聚共识,“议题守护者”的存在让印刷媒体从业者在发挥专业性作用的同时也起到了助力凝聚共识的作用。在此,我们开始触及第三个问题的核心,即公共议题的共识与议题守护者密切相关,传统公共领域中的守护者是具备专业素养的媒体工作者,而数字平台这一新型公共空间中的守护者正处于“缺位”状态,因此新型公共领域的交往行为乱象频出,对话伦理的存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传播技术的进步必然伴随着公共议题的“离散化”,那么公共领域的数字建构将不可避免地呈现“无序化”的趋势,伴随着“凝聚不起来”的共识,公共议题参与者队伍也将成为一盘散沙。这正是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衰落、对话伦理退隐的一种设想,他甚至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为例来说明对话伦理规范性所面临的困境。但这种被他诟病的现象,又何尝不是由这些支持者“各自为战”的观点凝聚起来的呢?不难发现,对话伦理的功能并不会就此消失,而是以其他方式存在并依旧发挥着凝聚共识的作用,尽管这是一种更加“极端”的共识。此外,在回答前两个问题时,我们已经论证过数字时代对话伦理共识性的存续具备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那么这种“凝聚共识”的载体又是什么?通过对数字平台“商品化”逻辑的分析,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作为“商品化”附属物的数字平台交往规则,进而破解其背后的话语法则:不是以对话协商而是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标的“独断式”平台话语规范。

二、对话伦理的存续可能:揭开数字平台话语规范的“面纱”

不可否认,以数字平台为载体的新型公共领域极大地降低了公共讨论的“准入门槛”,公共交往的广泛性前所未有。然而,我们发现数字平台的公共交往所展现出的力量并不像哈贝马斯所设想的那样因“离散”而“孱弱”,反而掀起了一阵阵舆论“浪潮”,数字平台“霸榜”的话题每日都有更新,这些话题无一例外会引发广泛的公共讨论,甚至一些事关公共事务的议题还会长时间让用户持续关注。这些话题本身是随生活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但在它们引发关注的时间内,它们所凝聚的共识是巨大的。尽管一些颇具争议的话题可能会有分歧严重的两方甚至多方观点,但将多元化的繁杂观点浓缩、凝练成具有代表性的几类典型观点,事实上也是一种“凝聚共识”的过程。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数字平台在失去哈贝马斯推崇的“议题守护者”后,仍能具备凝聚共识的可能?

答案很明显,数字平台的“议题守护者”并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同数字平台的营利目的密切相关。数字平台的利润主要来自消费者直接支付、消费者信息和广告服务三类^[17]。其核心均在于对用户数据的掌握,无论是消费者的支付习惯、浏览偏好还是商品购买需求等信息,均在数字平台的使用过程中抽象为数据,经由用户—平台的途径最终流向第三方商业机构,形成

了一个单向度的数据流通过程。这类由云计算技术处理的一般数据包含着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则是用户“生活世界”最直观的反映。因此，数字平台往往鼓励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张扬个性，因为采集到的数据越多，对用户的分析就越准确。平台进行用户分析的目的是获取商业利益，公共交往在此也转变为收集用户数据的渠道。因此，数字平台用户进行公共参与时表现出的多元化样态，从深层逻辑来看是符合数字平台的利益的；而数字平台在设置公共讨论的规则时也必然倾向于以“展现个性”为目的的规则内容，即通过以数据为基础运行的算法来塑造公共交往的规则，进而捕捉和渗入人类生活几乎全部的公共交往领域，“正是发生在数字平台上的数字劳动和交往活动被算法捕捉，进而让商业实现了对生活世界的全面入侵，导致公共领域新的转型”^[9]。

关于数字平台的算法逻辑我们暂且按下不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数字平台作为新型公共领域，其内部规则必然是同数字平台的利益诉求一致的，这使它与传统公共领域在交往规范上产生分歧。传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已经开始结构转型。各种社交机制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相互接触提供了保障”^{[18](237)}，交往规范的形成建立在公众参与的基础上，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议题内容，前者又强化了后者的个人身份，这一切为后来的主体间交往理性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但新型公共领域的交往规范形成逻辑则被颠倒过来，数字平台确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自身利益诉求的交往规范，用户参与公共活动的前提是他们必须遵守数字平台制定的交往规则，活动的效果则取决于数字平台交往规则的完善程度。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不难发现，“议题守卫者”的存在方式同公共领域交往规则的形成方式密切相关。传统公共领域内的议题守卫者由一系列新闻工作者充当，他们为诸如出版社等引领公共议题的机构服务。新型公共领域的议题守卫者“消失”的原因，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它们并不对上述传统公共领域的议题引领负责，而是对制定新型公共领域交往规则的数字平台负责，因此，它们的存在方式也必然不同于传统守卫者。平台、算法推动下的社交媒介拓宽了公共议题的参与方式，但是也通过平台规则驱逐公共性的方式解构甚至驱逐了对话伦理的根基。这种对公共性的反叛，恰恰是新型公共领域中议题守卫者的存在方式。由此，我们也能初步解释数字平台中公共议题参与者在观点上的极端多元特征，以及在这种多元特征下重建对话伦理、凝聚议题共识的可能。

数字平台使用户具备“数字身份”，其行为大致具有以下4个特点^[9]：(1)几乎以零成本进入数字公共领域，全民参与在技术上成为可能；(2)名义上的自主性，即在平台上接收和传递数字作品的能力；(3)形式上跨领域的言论自主；(4)自我赋权基础上的“圈地自萌”行为，这类兴趣小团体的出现往往又会加剧信息茧房的形成。(1)和(2)共同发挥作用让数字平台用户的知识水平和观念结构呈现多元化特征，准入门槛大幅降低；在(3)的影响下，其中一部分参与者容易片面接受被算法“投喂”的信息，他们在被哈贝马斯称作“自恋式的展示和自我激励”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将情感化、个人化内容倾注至公共领域内，最终形成了(4)的局面。在流量竞争的压力之下，数字平台本身开始设计大量抓取“粉丝”的路径，以平台营利为目标的算法逻辑天然固化了我们接触公共议题的渠道和视角，传统公共领域内的普遍交往在一系列强边界感的小团体间不断被撕扯甚至割裂。因此，数字平台用户的多元化特征固然与理性多元的当代社会发展状况相关，但更是数字平台逻辑的一个必然结果，数字平台在提供形式上的公共交往空间时，也在实质上以底层逻辑和规则架构的手段破坏着传统公共领域的公共性。

在此，不难发现新型公共领域中的对话伦理仍然存在，但与传统公共领域中的对话伦理不同的是，当下的对话伦理在规范性方面亟待重构，而重构的依据就在数字平台的规则架构逻辑中。如何让数字平台的革新技术赋能积极的公共交往，而不是以极端多元化的方式离散公共性？我们应当从数字平台的流量逻辑入手，反思以“抓取流量”为目的的规则架构和建基其上的话语筛选机制，以防止流量垄断为突破口，打破公共领域中隐含的话语法则强迫。

三、对话伦理的重构方案：规制数字平台的流量垄断

如前所述,数字平台的话语规则建构逻辑取决于其利益趋向,而进行商业活动的数字平台“天然具有某种从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趋势……网络效应、多边市场效应和基础设施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平台经济的自然垄断”^[19]。曾被哈贝马斯奉为圭臬的对话协商原则包含下述核心内容:主体的实践理性、言说方式、行为准则。而数字平台的垄断趋势客观上对这三个核心内容均有着不同程度的破坏,平台的话语规则完全围绕多领域垄断目的来建构,算法逻辑作为公共议题“守卫者”不仅如影随形,而且无孔不入。数字平台的垄断趋势损害的不仅是健康的市场竞争关系,还有对话伦理的公共性根基。公共议题及其共识性的凝聚本应建立在理性多元的商谈模式基础上,但现在却沦为数字平台以垄断为目的的话语法则的产物。为了摆脱算法逻辑对“语言”和交往行为的束缚,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传统公共领域中对话伦理的施展空间,按照将康德式的先验性原则从实践理性中去除的思路,将数字平台的“算法原则”从交往行为的“话语规范”中去除,以摆脱其非中立的影响。对话伦理的重构需要聚焦这一问题,即在有效运用数字平台进行公共商谈的同时,削弱乃至消除那些人为设置的“平台话语规范”,让作为对话伦理中介的语言范式在新型公共领域中得到“解放”。

恢复对话伦理的功能基础、凝聚共识的关键在于规制数字平台的垄断,尤其是流量垄断。首先,流量垄断的前提在于数据收集垄断。这一行为客观上加剧了“回音室”“信息茧房”等现象,严重损害了对话伦理的平等交往原则和广泛协商要求。在数字平台中重构对话伦理,需要借助公共传播的新技术、新手段,更大程度地促进主体的广泛参与,更充分地凝聚社会共识。因此,反制数据收集垄断行为就在于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在收集数据阶段就禁止平台主动或不加告知地收集与用户服务无关的非必要数据信息。这类信息收集越少,平台就越难以通过制定公共空间的“底层规则”来维持用户黏性,留住用户的方式也从“圈地自萌”的圈子规则转变为满足大多数用户需求的对话伦理规范。事实上,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往往需要规范性话语逻辑的“自然形成”,将话语逻辑的建构主题交予参与者自身。例如,哈贝马斯指出,17世纪到18世纪的传统公共领域媒介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咖啡馆,参与者往往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审美能力的贵族和市民阶层,其讨论的主题一开始也仅仅是对文学著作和艺术作品的私人看法,但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转变,公共领域的主要参与者转变为对经济政治等公共议题感兴趣的广大市民阶层,“围绕着文学和艺术作品所展开的批评很快就扩大为关于经济和政治的争论”^{[18](38)}。在此,我们不是要抛弃新型技术手段带给我们的交往便利,而是提倡一种公共空间参与者议题自主权的“复归”。因为公共议题的相关主题和内容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公共空间内对话伦理话语法则的形成,这种形成过程可能是缓慢的,但我们不能因为追求数字时代的“迅捷”而人为地“赋予”公共空间一种既定的话语法则。

其次,健全算法控制流量分配的监管机制。对数字平台来说,掀起流量浪潮就意味着利润,而流量的出现往往依赖用户的高频讨论。相较于枯燥无味的公共议题,那些极端差异化的私人领域的“完备性学说”更能引发讨论。因此,数字平台一开始就更偏爱争议性的话题,哪怕这类话题的内容同公共议题毫不相干,哪怕这种发展趋势对公共性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纠正这种行为,就需要健全流量分配机制,建立由一系列可观测指标构成的集合体系,拒斥野蛮生长的“带节奏”型数字平台,维护对话伦理的社会基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六)探索数据和算法安全监管”明确指出:“严肃查处利用算法进行信息内容造假、传播负面有害信息和低俗劣质内容、流量劫持以及虚假注册账号等违法违规行为。”纠正“唯流量”的数字平台导向,是营造健康理性公共空间、形成符合公共议题参与者期待的对话伦理方式的重要措

施。

最后，保持数字平台主导对话交往过程中的中立性。针对平台企业的数据垄断者和业务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应当将平台企业的基础设施与经营者身份进行分离，避免大平台通过话语法则强迫的方式为其自营业务背书，以牺牲话语法则理性客观的代价获取资源优势 and 超额利润。正如传统公共领域并不是特指某个“头部咖啡馆”一样，作为新型公共领域的数字平台也不能一家独大或几家独大。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数字平台不仅是人们进行公共交往的途径，更是公共交往发生的场域，一旦个别头部平台倚仗其垄断地位而人为设置过高的公共交往“平台准入门槛”，那么公共交往的普遍性就不可避免地被迫缩小至该平台提供的“私属性”“公共空间”内部，成为技术加速和资本主义规训效应的结果^[20]。防止数字平台无序扩张，对平台并购与跨市场集成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同样是促进公共议题健康发展的必要举措。同时，应当加大力度推广由有关部门主导的智能高效数字平台。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运行，更有助于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渠道，提高公众参与程度，为形成被广泛认同的公共价值提供有力支撑。

四、结语

如何冲破数字平台的话语规范桎梏，实现对话伦理在新型公共领域的复归，营造一个适合大众的商谈性公共空间并在其中践行对话伦理的基本要求，是当代政治哲学必然会遇到也必然要予以解决的问题。对话伦理的时代证成，其目的并不是要实现传统公共领域的“回退”，而是在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新型公共领域重建主体间交往的共识性规范。这种规范原则的建立势必要打破数字媒体中界面协议隐含的话语法则的强迫，重构界面规则之外的标准、价值和观念^[21]，因此需要我们深入数字平台的流量商业逻辑进行分析。哈贝马斯认为对话伦理衰退的原因是数字平台的话语法则本身就意味着极端的平等主义和公共议题中心的离散化，换言之，意味着“没有规范性”。但数字平台的流量逻辑和商业目的共同表明，作为新型公共领域的数字平台内部仍然存在着规范性的话语法则。随着公共领域的新转型，对话伦理只有经历一次“涅槃”，方能在相关部门主导的新型数字平台内展现其凝聚共识、塑造社会秩序的功能，以满足当代政治哲学对复合型社会规范理论的合理性要求。对话伦理的重构，需要依靠这类新型数字平台内主体间的广泛作用与契合协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型数字平台之内，对话伦理将借助公共传播的对话过程建立更密切的社会关系，塑造主体间交往行为的信任和公共价值的共识。

参考文献：

- [1] 哈贝马斯, 哈勒. 作为未来的过去: 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M]. 章国锋,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131.
- [2] HABERMAS J.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M]. Frankfurt: Suhrkamp, 1995: 437-438.
- [3] 王凤才. 再谈“合理性问题”: 从哈贝马斯视角出发[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6(1): 118-130.
- [4] HABERMAS J. Ein neuer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d die deliberative Politik[M]. Berlin: Suhrkamp Verlag AG, 2022.
- [5] 休谟. 道德原理探究[M]. 王淑芹,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91.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40.
- [7] BUKHT R, HEEKS R. Defining, 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7(13): 1-24.
- [8] GAWER A. Digital platforms' boundaries: The interplay of firm scope, platform sides, and digital interfaces[J]. Long Range Planning, 2020(5): 1-16.

- [9] 董山民. 数据、平台媒介与公共领域的危机[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16–25.
- [10] HARDT M, NEGRI A. Multitude[M].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2004: 108.
- [11] 温赛克, 徐偲骅. 重构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J]. 新闻界, 2018(4): 51–61.
- [12] FUCHS C.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M]. London: Routledge, 2014: 254.
- [13] 曼泽罗尔, 姚建华, 徐偲骅. 移动的受众商品: 无线世界的数字劳动[J]. 开放时代, 2017(3): 181–191, 9.
- [14] 孟飞, 程榕. 如何理解数字劳动、数字剥削、数字资本: 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J]. 教学与研究, 2021(1): 67–80.
- [15] GAUS G. The order of public reason: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morality in a diverse and bounded worl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76.
- [16] WALL S. Public reason and moral authoritarianism[J].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13(250): 160–169.
- [17] LAMBRECHT A, TUCKER C E, WIERTZ C. Advertising to early trend propagators: Evidence from twitter[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8(2):177–199.
- [18]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 王晓珏, 刘北城, 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19] 程恩富, 王爱华. 数字平台经济垄断的基本特征、内在逻辑与规制思路[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8(5): 1–10.
- [20] 雷禹. 社会加速批判的视角转换: 从马克思到当代激进思想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1(2): 64–74.
- [21] 马俊峰, 赵海蕴. 数字资本权力运行的三重逻辑[J].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 2024, 4(1): 89–100.

Out of the digital dilemma: Surviv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dialogue ethics in the new public sphere

YUAN Hang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Dialogue ethic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the emergence of new public domains with digital platforms as the main form, has led to a complicated digital dilemma of “consensus building” in dialogue ethics. In fact, the foundation of dialogue ethics still exists in digital platforms, bu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treat of public issue “guardian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se “guardians” who help to consolidate consensus have become profit-oriented “algorithmic logic” in digital platforms. Carrying the banner of “personalized services”, these digital platforms actually divide the traditional public communication space by reflecting the discourse law coercion. To break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discourse rules and to rebuild consensus norms for inter subject communication within digital platforms, we need to regulate the phenomenon of traffic monopoly from such three aspects as “data security system” “traffic distribution regulation” “self-operated business regulation of top platforms”, promote government-led composite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digital platforms, and create a negotiable public space suitable for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dialogue ethics.

Key words: dialogue ethics; digital platform; algorithmic logic; platform discourse rules

[编辑: 胡兴华]